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

(中)

张勋燎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北朝道教造像再研究

数年前曾撰《北朝道教造像的考古研究》一文，作为笔者和白彬合著《中国道教考古》^[1]一书的部分内容。该书脱稿尚未出版之际，应法国高等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宗教学系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的邀请，为其主编的多卷本之《唐以前的中国宗教史》（Rituals, Pantheons, Techniques: A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 before the Tang Period）一书撰写《北朝道教造像碑》（Daoist Stelae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专章。为此，我和白彬以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治佛教考古的雷玉华博士一行三人，于2005年5月专程前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碑林博物馆、西安市博物馆和耀县药王山、临潼博物馆、富平文管所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结合包括新近出版而过去没能看到的一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根据劳格文教授“在综合学界已经发表的成果基础上补充一部分作者的个人意见，力图让读者对相关问题能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的要求，撰成六万余言的书稿，就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综合论述，对过去的有关研究内容加以订正和补充，并已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2]。2007年11月，笔者前往四川北部的广元、剑阁考察，见到一些最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后，又萌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本篇汇集笔者近期研究的有关成果，作为《北朝道教造像的考古研究》的续篇，以造像碑题记材料作为主体，着重从宗教社会史角度就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凡前文已有论述者，一般不再重复。

一、学界有关发现与研究的新发展

《北朝道教造像的考古研究》成稿之后新出版和见到的材料，有关论著主要有李改、张光溥编《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3]，李淞《一位县令解决冲突的一个探索性方案：

[1] 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

[2] Zhang Xunliao, Daoist Stelae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us: Part Two: The Period of Division* (220—589 AD), John Lagerwey and Lv Pengzhi (eds.). Leiden: Brill, 2010, Vol. 1, pp.437—543.

[3] 李改、张光溥编：《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药王山管理局，1999年。

陕西福地水库西魏佛道混合石窟的图像与观念》、《泾渭流域北魏至隋代道教雕刻详述》、《美国三家博物馆所见中国道教雕刻》^[1]，张泽珣《北朝道教造像碑艺术》^[2]、《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3]，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4]等。胡文和的《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主要着眼于造像外部形态的考察，提供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对造像记和供养人题铭方面的材料则不甚重视，著录全文者不多。李改、张光溥编《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虽然正文部分主要是以图版为主的资料介绍，佛、道并录，道教部分的内容不多，但书前由石兴邦先生撰写的序文却是一篇水平很高的研究性著作，从社会史、民族史的角度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观点。张泽珣的博士学位论文《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虽然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也没有正式出版，但收集包括造像记和题名在内的铭文材料最为丰富，也有若干新的看法，是所见研究有关北朝道教造像记比较系统的一项颇有价值的新成果。

承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研究员的热心帮助，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了他在山西芮城见到的几件北朝道教造像碑材料目录，虽然没有详细的考察报告，但却给北朝晚期道教造像碑文化在晋西南地区的发展情况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在此，我们特别要提到2007年在四川剑阁下寺新发现的北魏道教石龕造像材料，它虽然不是造像碑，但却是为数不多的北朝道教造像向西南发展进入四川的确凿物证，直接影响了后来四川地区道教石窟造像的发展，为解开何以隋、唐、两宋四川道教石窟造像独盛于全国之谜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2007年，在剑阁新城附近的基建工程中发现的北魏道教摩崖龕像，位于旧城西北白龙江下游的下寺镇下寺河岸。闻讯我即于当年冬与白彬、雷玉华专程前往考察，虽然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到现场目睹原物，却在广元皇泽寺博物馆书记王剑平副研究员的电脑上看到了刚出土时拍摄的数码照片。从照片的情况看，崖面保存龕像大约有十窟左右，窟形不大，单龕摄影，泥垢尚未清洗，有一窟三像保存完好，像高约30厘米。最初虽不知有纪年题记，中间一像所著十字形小冠及龕楣交缠之双龙，明显与耀县药王山北朝道教像碑相似^[5]，初步判断应为北朝遗迹。后剑阁县博物馆卜龙馆长告知，两侧题记残刻有“大魏□昌……”字样，清晰可辨。铭中的“大魏”即北魏，北魏年号末字为“昌”者，有北魏宣武帝“延昌”（512—515年）、孝明帝“孝昌”（525—527年）和孝武帝“太昌”（532年），“太昌”只有一年，“昌”字前泐缺一字为“太”字的可能性不大，当为“延”或“孝”字。南北朝时期剑阁所在的四川北部地区，最初属南朝管辖，萧梁天监四年即后魏正始二年（505年），汉中太守夏侯道叛梁降魏，魏遣邢峦率军取剑阁，为后魏初入蜀据剑阁及川北之后，剑阁地区的归属形成拉锯之势，至553年西魏取蜀四年之后，北周覆亡

[1] 李淞：《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2] 张泽珣：《北朝道教造像碑艺术》，香港：明石文化国际出版公司，2002年。

[3] 张泽珣：《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4]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雷玉华研究员告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造像小龕作此种形制者甚多。

而为西魏所取代，剑阁亦随蜀土一起成为北周辖地。其间，郡县之名不时改易，南安、晋安、永归（今剑阁之三岔河）、胡原、临津（隋），或郡或州或县，难以悉辨^[1]。考虑到在正始二年（505年）剑阁最初开始归入北魏以后受北方道教造像文化影响开始凿崖造像，一般说来有一个过程，推测属于“孝昌”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今姑订为“孝昌”。无论北魏宣武帝“延昌”还是北魏孝明帝“孝昌”，都在北魏初入蜀据川北之后，上距孝文帝太和迁洛及迄今所知年代较早的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王伯安造“老君”石像、今存太和二十年（496年）姚伯多造像已数十年，与历史发展情势亦相吻合。其余诸窟，因无单窟数码照片，又未能到实地进行考察，性质年代情况不明，但从位置情况看，彼此之间应有密切联系（有关照片资料，因材料尚未公开发表，不便在此刊载）。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在《北朝道教造像的考古研究》一文所附《北朝纪年道教造像碑著录表》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增加栏目，补充资料（表一），以便后面的论述，并提供学界参考。

表一 新订北朝纪年道教造像碑（附石窟造像）著录表

编号	名称	自著像名	年代	性质 类型	出处	备注
1	魏文朗造佛 道像碑		北魏始光元年（424年）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 1—7页	
2	张道君造一 面道像		北魏太和六年（482年）		The Field Museum, Chicago 藏；《造像记研 究》，第115页录文	
3	王伯安造道 像碑	“老君”	北魏太和十四年（490 年）九月四日		《罗雪堂全集》续编，第 3册，第1015页；《造 像记研究》，第115页	
4	“道民”姚伯 多造道像碑	“皇老君”	北魏太和二十年（496 年）九月四日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 9—38页	
5	刘文朗造道 像碑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四月一日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 39—43页	
6	“男官”傅 溶造两面道 像碑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三月十六日	家庭	The Field Museum, Chicago 藏；《造像记研 究》，第119页录文	陕西出土
7	杨阿绍造道 像碑		北魏景明元年（500年） 八月十八日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 44—46页	

[1] 有关南北朝时期剑阁所在地区归属变化的历史情况，任乃强《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和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二书皆有详细的论述，可供参考。

续表

编号	名称	自著像名	年代	性质 类型	出处	备注
8	杨纁黑为父 造道像碑		北魏景明元年(500年) 八月三十日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 47—49页	
9	“道民”冯 神育同邑 二百人等造 道像碑		北魏正始二年(505年) 九月二十六日	合邑	《造像碑精选》，第 50—57页	
10	“道民□□” 造道像碑		北魏永平二年(509年)		日本永青文库藏；《佛像 图典》，图83；《造像记 研究》，第125页有永平 年(508—512年)“道民” 造三尊道像记文，云引自 《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不知是否即此碑	
11	朱奇兄弟三 人等为父母 造道像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 七月十五日	家庭	西安碑林藏；《造像记研 究》，第124页录文	陕西华县瓜 支村出土
12	“道民”吴 [洪] 櫟兄 弟佛道像碑		北魏延昌年间(512— 515年)	家庭	《造像记研究》，第125 页录文	
13	张相造道像 碑	“天尊”	北魏延昌二年(513年) 三月二十九日	家庭	《北图藏石刻》第3册， 第28页	
14	张乱国造道 像碑		北魏延昌三年(514年) 三月七日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 58—62页	
15	盖氏造道教 三尊石像碑		北魏延昌四年(515年) 四月五日		日本大阪(美术)博物馆 藏；《佛像图典》，图 97；《造像记研究》，第 128页称“盖氏道教三尊 石像”；《道教石刻艺术》 上册，第65页称“盖氏 等造道教三尊式石像”	
16	“大阳县令” 焦采造二尊 道像碑		北魏延昌四年(515年) 四月	个人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佛教雕刻》图版编，图 852；《造像记研究》， 第128页录文	

续表

编号	名称	自著像名	年代	性质 类型	出处	备注
17	邑子田良宽 等四十五人 造道佛像碑		北魏延昌年间(512— 515年)	合邑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造像记研究》,第129—130页录文,“邑子四十五人等道佛造像碑”;《道教石刻艺术》下册,第411页造像图版	
18	邑子七十人 等造佛道像 碑		北魏熙平年(516—518 年)	合邑	耀县博物馆藏;《药王山碑石》,第33—37页	
19	吕荣升造道 像碑	“太上君”	北魏熙平二年(517年) 五月	合邑	陕西耀县博物馆藏;《北朝石刻》,图12;《造像记研究》,第130页,据《西安碑林全集》著录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富平出土熙平二年“邑子六十人道佛造像碑”录文,不知是否即此碑	
20	张安世造佛 道像碑		北魏神龟二年(519年) 四月八日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69—73页	
21	邑老田青五 家七十人道 佛造像碑		北魏神龟二年(519年) 七月二十日	合邑	临潼市博物馆现藏;《造像碑精选》,第63—68页称“王守令造佛道像碑”者误	
22	“门师”张 千度七十人 等合邑造佛 道像碑		北魏神龟二年(519年) 十月十四日	合邑	《造像记研究》,第131、132页录文;《陕西金石志》卷六称“道民刘道生造像碑”	陕西栌阳出土
23	“道民□□” 等造佛道像 碑		北魏神龟二年(519年)		《文物》1985年第4期,第20页	
24	“邑师”锺双 胡合邑二十人 造道像碑		北魏神龟三年(520年) 四月八日	合邑	《造像碑精选》,第74—79页	
25	“举家二十 人”造道像		北魏正光二年(521年) 四月	家庭	《道教石刻艺术》上册,第81页	

续表

编号	名称	自著像名	年代	性质 类型	出处	备注
26	铸麻仁“合家 一百二十九口” 造道像碑		北魏正光二年(521年) □月二十日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 80—85页	
27	茹氏合邑一 百人造佛道 像碑		北魏正光三年(522年)	合邑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 朝石刻》,图22、图115; 《造像记研究》, 第139、140页录文	《北朝石 刻》原误注 陕西耀县药 王山
28	杨曲仁造佛 道像	“老子、 释迦”	北魏正光三年(522年)		《集古录目》卷一	
29	师录生七十 一人等造四 面佛道像碑	“如来、 大圣”	北魏正光四年(523年) 七月二十六日	合宗 邑	《造像碑精选》,第86— 91页;《造像记研究》, 第140—143页录文	
30	仇臣生造两 面佛道像碑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 七月十五日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 92—94页;《造像记研 究》,第144页录文	
31	“道士”郭法 洛造道像(像 主刘延达)		北魏孝昌二年(526年) 二月三十日	合邑	《北图藏石刻》第5册, 第19页	
32	庞双造四面 佛道像碑	“太上老 君、太上道 君”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 四月八日	合邑	《造像碑精选》,第 95—99页	
33	道像		北魏孝昌□年(525— 527年)		广元剑阁县下寺,王剑平、 卜龙见告	摩崖石窟龕 像
34	“道民女官” 王阿善造道 像碑		北魏隆绪元年即孝昌 三年(527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	家庭	《文物》1961年第12期, 第54页	
35	“道民”吴 [洪]櫟造 道像碑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 前后[其年代张泽珣以 为512—515年间,胡 文和以为熙平至武泰年 间(516—528年)]	家庭	《药王山碑石》,第38— 44页;《道教石刻艺术》 下册,第95—100页图 版;《造像记研究》,第 125、126页录文	
36	佛道三尊像 碑		北魏永安元年(528年) 十月九日		法国吉美美术馆藏;《佛 教雕刻》本文编,第272 页文、图218	

续表

编号	名称	自著像名	年代	性质 类型	出处	备注
37	□道成造一面道像碑	“龕内一道二侍者”	北魏永安三年(530年) 十一月十日	家庭	The Field Museum, Chicago 藏;《造像记研究》,第148页录文	
38	“道民”、“佛弟子”樊奴子造佛道像碑		北魏太昌元年(532年) 六月七日	家庭	《造像记研究》,第151、152页;《六朝道教思想》,第475页录文	
39	张暎周造道像碑		北魏永熙二年(533年)		陕西耀县出土;《北朝石刻》,图23	
40	道民吴□迫造道像碑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 八月七日		日本大阪(艺术)博物馆藏;《佛教雕刻》本文编,第47、272页文,图版218;《造像记研究》,第148页录文	
41	毛遐造佛道像碑		西魏大统元年(535年) 二月□日		药王山博物馆藏;《考古》1965年第3期,第140页;《药王山碑石》,第77页录文	
42	道士吕贵里等造佛道像		西魏大统元年(535年) 七月九日		陕西宜君县福地水库;《文物》1989年第4期,图版肆,4	石窟
43	山西芮城蔡洪陞世孙造道像碑	“太上老君”	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四月八日	合宗邑	《道家金石略》,第31—33页	
44	辛延智“合诸邑子七十人等”造佛道像碑	“大道、如来二圣”	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四月二十一日	合邑	《造像碑精选》,第100—105页	旧称“邑子七十人造像碑”
45	“精进士”佳文贤为亡母造四面佛道像碑		北齐天保五年(554年)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博物馆藏;《六朝道教思想》,第477页	
46	强独乐为北周文王造佛道像碑		北周闵帝元年(557年)	家庭	《文物》1986年第3期,第53页	

续表

编号	名称	自著像名	年代	性质 类型	出处	备注
47	绛阿鲁造四面佛道像碑		北周武成元年(559年) 十月八日	妇女 合邑	《造像碑精选》,第106—110页	
48	四面道教造像碑		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年)		山西芮城县博物馆藏,张建林见告	
49	道民马洛子造四面道像碑	“老君”	北周保定元年(561年) 四月八日	家庭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文物》1961年第12期,第55页	
50	“清信士”辅兰德造道像碑		北周保定元年(561年)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111—118页	
51	道像碑		北周保定二年(562年) 正月二十三日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佛教雕刻》本文编,第343页、图版857	
52	“佛弟子李县信兄弟等”造佛道像碑	“释迦、太上老君诸尊菩萨”	北周“保定二年(562年)岁次壬午十二月丙申朔十五日功讫”	家庭	《造像碑精选》,第119—123页	
53	“道民鄆县令许多谨造”道像碑	“太上老君”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 八月二十八日	家庭	《佛教雕刻》本文编,第343页、图版857	
54	姚道珍造道像碑	“老君”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罗雪堂全集》初编,第3册,第947页	
55	“男官姜纂”造道像碑	“老君”	北齐天统元年(565年) 九月八日	家庭	河南偃师出土;《金石萃编》卷三十五	
56	“道民”杜崇口造道像碑	“老君”	北周天和二年(567年) 三月二十四日	家庭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藏;《佛像图典》,图214	
57	“道民弟子”全荷造道像	“天尊”	北周天和二年(567年) 四月十九日	家庭	陕西西安出土;《陕西金石志》卷六;《南北朝道教造像》,第235页	
58	四面道教造像碑	螭首,龟趺,四面大小30余龕	北周天和二年(567年)		山西芮城县博物馆藏,张建林见告	

续表

编号	名称	自著像名	年代	性质 类型	出处	备注
59	道民朱巴人造道像碑		北周天和三年(568年) 八月十二日		《语石》卷五	
60	四面道教造像碑		北周天和三年(568年)		山西芮城县博物馆藏, 张 建林见告	
61	蔡振虎造道像	“老君”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 十二月八日		《安徽金石》卷十五	
62	清信女造四面佛道像碑	二面佛十 区、二面道 八区	北周天和五年(570年) 三月十日	家庭	《匋斋藏石》卷十四	
63	李元海兄弟七人等造四面道像碑	“元始天尊”	北周建德元年(572年) 九月十五日	家庭	美国弗里亚美术馆藏; 《佛教雕刻》图版编, 图 859—861; 《道家金 石略》, 第 39、40 页	
64	骑(骑)马仁造道像碑	“老君”	北周建德元年(572年) 十二月十五日		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六朝道教思想》, 第 476 页	
65	“清信弟子孟阿妃”造道像碑	“老君”	北齐武平七年(576年) 二月二十三日	家庭	河南偃师出土; 《金石萃 编》卷三十五	
66	道民王大人等五人及邑主马天祥等造道像碑		北齐武平九年(578年) 二月二十八日	合邑	《金石萃编》卷三十五	真伪有争议, 姑列于此

缩略语:

《安徽金石》——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1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北朝石刻》——张鸿修:《北朝石刻艺术》,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北图藏石刻》——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道家金石略》——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道教石刻艺术》——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佛教雕刻》——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佛像图典》——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集古录目》——欧阳斐:《集古录目》,《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1977年。

《金石萃编》——王昶：《金石萃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影印1921年扫叶山房石印本，1990年。

《六朝道教思想》——神冢淑子：《六朝道教思想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99年。

《罗雪堂全集》——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续编，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

《南北朝道教造像》——神冢淑子：《南北朝時代の道教造像》，砺波护：《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明文舍印刷株式会社，1993年。

《陕西金石志》——武树善：《陕西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

《匋斋藏石》——端方：《匋斋藏石记》，宣统元年（1909年）刊本。

《药王山碑石》——李改、张光溥编：《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药王山管理局，1999年。

《语石》——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造像碑精选》——陕西省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

《造像记研究》——张泽珣：《北魏关中道教造像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二、北朝道教造像的形制特征及其与佛教造像的区别

北朝道教造像碑，虽然造像本身和凿龕造像的形式是学习佛教，但采用竖长方形石材作成碑形，却是结合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石碑形制而有所变化，碑头和一般的墓碑和其他纪念性质的石碑不同，不是做成带有篆额的半圆弧形或圭形，而是附加榫卯结构的人字坡顶盖。造像碑的体积大小^[1]，保存比较完整的最高219厘米（正光四年师录生“合宗邑子七十一人等”造佛道像碑），最低68厘米（太和二十三年刘文朗道像碑），最宽77—78厘米（正光二年锺麻仁道像碑、正光四年师录生“合宗邑子七十一人等”造佛道像碑），最窄40—44厘米（大统十四年辛延智造佛道像碑），最厚28—33厘米（武成元年绛阿鲁造佛道像碑），最薄15—20厘米（景明元年杨纁黑道像碑）。每面凿龕数量多寡不等，一般是一面凿一龕，有少数在一面左、右或上、下各凿一龕，左、右各凿一龕者在碑石的正面，上、下各凿一龕者则多在碑石的侧面，但亦间有在正面的。龕的大小，以神龟二年（519年）张安世佛道像碑为例，高31.5—33、宽34.5—40、深8厘米。像龕的深度不大，他碑之浅者仅2厘米。石面没有造像的部分，多用阴线刻出带题名的供养人像及造像记，有少数全为空白。

早期的佛教和道教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是“佛教重崇像”，特别注重偶像供奉，

[1] 主要参考陕西省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等编《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二书资料作归纳叙述。

被称作“像教”^[1]。而道教则主张“道无形质”^[2]，认为道是没有形状的东西，最初完全没有偶像供奉之说。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讲的老君形象十分怪异，只是一种心中存想的概念，而不是经过物化处理的直观视觉实物。铜镜、陶俑、画像石、画像砖等器物上面的天帝、西王母之类与道教有关的形象，也只是作为一种宗教神话传说性质的人物出现，和后来供奉所用的宗教偶像性质不同。过去人们之所以把佛教称作“像教”，正是为了突出佛教的这一特点与道教相区别。僧人们说，后来道教造像的兴起完全是学习佛教造像的结果^[3]，如果去掉属于宗派的感情色彩，应当是事实。正始二年（505年）冯神育合邑二百二十人造四面道像碑记称，大道玄妙，道神难遇，“自非镂像污形，其孰（孰）能睹之者哉”，如果不建造尊像，常人是无法见到的。孝昌三年（527年）庞双造“太上老君”、“太上道君”并佛像碑，造像记文特别强调说：太上道君石像的建造，“相好无边，万圣归宗”^[4]，精妙传神，仿佛其他许多道神也都前来朝谒的样子。有材料表明，当时作为供养偶像的道教造像，已经得到道教信奉者的一定重视，对道像的姿态仪容也相当讲究。但作为整个道教造像兴起初期阶段的北朝道教造像碑，从龕形、头上带有圆光的像形到胁侍配置和龕上的天宫，龕下的香炉、双狮等附属图像部分的造型、组合看，都与佛教造像大体一致，甚至完全相同，很难将之与佛教造像区别开来，以后才逐渐具有独自的特征。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造像的为佛为道，性质很难准确判定，过去我们也曾对此感到迷惑。后来我们联合专门从事佛教考古的学者一起共同进行实地考察，结合造像记材料就造像特征仔细比较研究，初步总结出区分道、佛造像以下的五项主要标志：

（1）道像多有胡须，络腮或一缕、三缕。如辅兰德碑阳龕像，保存完好，清晰可见（图一）。而佛像一般是没有胡须的。

（2）道像主尊一般右手（即观者之左手面）执拂尘或双手捧玉璋，佛像手中则无此持物（唐代佛像受道教影响开始间有少数执麈尾者）。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刘文朗造道像碑，阳面上部龕中并列三像，中间主尊坐像和左右二立侍像皆双手捧长

[1] （唐）释法琳等《上秦王论启》：“自后汉明帝永平三年。梦见金人以来，像教东流，灵瑞非一，具在汉魏诸史，姚石等书。……自五百余年已来，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辅，并由时君敬信，朝野归心。像教兴行于今不绝者，寔荷人王之力也。”（《广弘明集》卷十一，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52册，第161页）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新出北周静帝宇文赸大象二年（580年）七月二十一日佛像座刻发愿文，有“正信佛弟子张子开睹佛法重崇像”之语。

[2] （唐）释法琳撰，陈子良注：《辩正论》卷六，《九箴篇》，《内异方同制八》引任子《道论》（《广弘明集》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185页）。

[3] （唐）释法琳撰，陈子良注：《辩正论》卷六，《九箴篇》，《内异方同制八》：“近世道士，取法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立形象，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广弘明集》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185页）

[4]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第136页。



图一 北周保定元年（561年）辅兰德造道像碑阴道像主尊
（白彬摄影）

方板状物于胸前（图二），有人认为三像皆“手持笏板”^{〔1〕}，其实中间主尊所执者与左右二胁侍手执之笏板形状不同，应是玉璋。北周保定二年（562年）李昙信造“释迦、太上老君诸尊菩萨”佛道像碑，碑阴道像面上部龕中并列三像，中间主尊坐像手执拂塵（有的学者称为“羽扇”），左右二立侍像皆双手捧长方笏板于胸前（图三），阳面为佛龕，造像手中皆无此种持物，与道像明显不同^{〔2〕}。根据唐代释法琳的记载，天尊、大道身披黄褐，“手把玉璋”^{〔3〕}，是道像主尊手中所执长方板状物是代表玉璋，和供养人以及主尊两侧胁侍手捧之笏板不同。有道书记载说，天尊坐像，空手不执如意、

〔1〕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第126页。

〔2〕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第120、140页。

〔3〕 （唐）释法琳撰，陈子良注：《辩证论》卷五，《释李师资篇第四》：“岂有头戴金冠，身披黄褐，鬓垂素发，手把玉璋，别号天尊，居大罗之上，独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522页）



图二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刘文朗造佛道像碑阳道像主尊
（白彬摄影）

麈拂^[1]，与北朝道教造像碑龕中主像天尊手中多执麈拂材料不合，可能和时代、地域或教派不同有关。

（3）道像主尊以腰间束玉带为特征，与佛像的袈裟装束有别^[2]。道像腰间有宽带紧紧束住外衣，如北魏神龟三年（520年）碭双胡合邑二十人造道像碑，碑阳和碑阴的主尊道像（图四）就是典型的例子。佛像即使有时腰间系带，也是束于裙外披帛之内，

[1]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造像品：“天尊平坐，指捻太无，手中皆不执如意、麈拂，但空而已。”（《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4册，第748页）

[2]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第131页。



图三 北周保定二年（562年）李昙信造佛道像碑正面太上老君像
（白彬摄影）

或裙之上端翻转将带子掩住而不显露于衣外。

（4）道像头戴前面多呈十字交叉的板形笄冠（图五）^{〔1〕}，亦间有上部略似山字形者^{〔2〕}，与佛像之头上着螺髻者不同。道书记载道冠种类很多，有所谓“鱼鹄冠”、“重迭冠”、“通天冠”、“辟邪冠”、“龙蛇冠”、“虚无冠”、“元气冠”、“百变冠”、“元始冠”、“远游冠”、“玄冠”、“二仪巾”等等^{〔3〕}，随时变换，目前还很难将

〔1〕 见北魏正光二年（521年）犍麻仁造道像碑阳面主尊像。

〔2〕 如美国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傅口造二面道像碑，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上册，第42、43页，图版4-1、2。

〔3〕 《三洞珠囊》卷八，相好品引《法轮经》：“老子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者，老子有九变：第一变，身長六尺六寸，冠鱼鹄冠，八缘凤衣。第二变，身長七尺七寸，重迭冠，白衣赤领赤袖。第三变，身長八尺八寸，通天冠，服五彩之衣。第四变，身長九尺九寸，辟邪冠，服罗袿衣。第五变，身長一丈三寸，龙蛇冠，着朱光之衣。第六变，身長一丈七寸，虚无冠，着黑毛羽衣。第七变，身長一丈一尺，元气冠，着龙蛇衣。第八变，身長一丈一尺五寸，百变冠，服自然衣。其老子第九变之时，身有七十二相，应七十二气、八十一品也。”（《道藏》第25册，第345、346页。）唐宝道士《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上，“巾冠品”：“若道士若女冠，平常修道戴二仪巾，巾有两角，以法二仪。若行法事，升三箬众斋之坛者，戴元始、远游之冠，亦有轻葛巾之上法元始之所服。故天真上圣，或巾九德，或巾七星者，即冠巾有七星之文也。亦谓玄冠，玄即天也，亦言天有七星。”（《道藏》第24册，第768页）



图四 北魏神龟三年（520年）锺双胡造道像碑背面主尊
（白彬摄影）

道像遗存和文献记载一一对应起来。

（5）道像胁侍和供养人中的道士，手捧朝拜天尊所用的笏板，佛像无此项内容。北朝道教像碑之执笏板者，除部分龕像主尊之胁侍如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刘文朗碑（图二），神龟二年（519年）张安世造佛道像碑，孝昌三年（527年）庞双造四面佛道像碑之右侧^[1]，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辛延智造“大道、如来二圣”佛道像碑之碑阳道像^[2]，北周保定二年（562年）李昙信造“释迦、太上老君诸尊菩萨”佛道像碑阴的道像等，都是如此。龕外阴刻供养人像，执笏或不执，两种材料都有。如北魏孝明帝神龟三年（520年）锺双胡造四面道像碑，正面龕外四层供养人，包括题名“富平县令王承祖”、“邑师锺双胡”和“但官”、“侍者”、“平望”、“邑正”、“邑子”等数十人^[3]；北魏正光二年（521年）锺麻仁造道像碑题名画像^[4]；北魏孝昌三

[1]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第98页。

[2]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第104页。

[3]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第74、75、78、79页。

[4] 《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第80、81、84、85页。